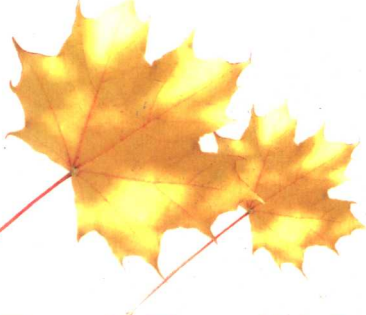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辛涩的旅程

XINSEDELVCHENG

不要怕，不要悔

.....

你出生的时候，你哭着，周围的人笑着；
你逝去的时候，你笑着，而周围的人在哭！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辛涩的旅程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新的创造与实验	1
第一节	仅仅是复苏或舒展	1
第二节	从创作方法到审美精神的 潜移	10
第三节	描写的此岸性与表现的彼 岸性	21
第四节	诗化:写实与象征的和谐	31
第五节	故事与模糊的寓言倾向	41
第六节	“寻根”:现实主义精神的 实验	50
第二章	背景的若干透视	6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 观念	61
第二节	魔幻的“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	73
第三节	“革命现实主义”在当代 中国	83

第三章	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小说	
	前景	102
第四章	阐释的可能性	111
第一节	文学判断的“困境”	111
第二节	角度与方式的选择	116
第三节	解析的前提及“自我 提醒”	124
第五章	艰辛苦涩的旅程	134
第一节	“革命功利主义”的变异	134
第二节	真实性:摇晃的原则	147
第三节	人物刻画理论及其“典 型观”	158
第四节	“英雄时代”:人与精神	170
第五节	夹缝中的“中间人物论”	180

第一章

新的创造与实验

第一节 仅仅是复苏或舒展

这是一种错觉：即以为历史的运动是以循环的或大圆圈的方式行进的——似乎是“周游”一番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其实历史的发展是呈螺旋形的：它走过头了，往往可能作出某种“回归”的假象，或在实际运动中也真的出现了某些“回归”的内容，但无论怎样析说，恢复历史的原状是绝不可能的。它总是变化了：即使是倒退，也只能以“变化”来概括；它总是改变了自己的模样，而这种“改变”所出现的新形态，无论好坏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以这种观点来阐释“新时期”的开端——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小说所呈现的单纯而复杂的现象，是否可以截获一些新鲜的或不落俗套的理解呢？

1976年10月，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同时也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但无论是结束还是开始，都表

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一般都把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作为一种标志,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起步与现实主义精神在小说领域的“回归”,而《班主任》的发表日期是1977年11月(离1976年10月仅一年多)。毫无疑问,《班主任》可以作为现实主义精神在小说领域“回归”的鲜明标志,但就现实主义的“复苏”(或“回归”)来说,却不是一篇小说可以说明问题的——就如新时期文学的开始一样,它是一个复杂的、并不轻松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经历了“拨乱反正”。经历了对于“黑线专政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以及“黑八论”批判的批判,经历了对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形形色色极左思潮的清算,当然也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历了“两个凡是”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等等。这种必然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风风雨雨,不仅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遗留问题,而且也自然而然地掀起一场场新的论争,譬如“伤痕文学”的论争、“向前看文艺”的论争、“歌德”与“缺德”的论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个过程——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或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复苏”才趋于完成。特别是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1979年,中国的文学世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景象,现实主义小说的好作品不断地“轰动”社会的阅读领域,文学理论的探讨也显示出自己的生机勃勃的潜在力量,许多长期被视作“禁区”的文学课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社会人性问题、悲剧问题、“中间人物”问题、“暴露黑暗”的问题、“两结合”创作方法问题、创作自由的问题,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胆而富

有开拓性的探索。现实主义的“复苏”，无疑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之一。

(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界通常使用的概念是“回归”，但细细想来，“回归”的说法显得粗疏简单了一些，它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回归”到哪儿去？难道要“回归”到 50 年代或 60 年代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去么？)

在这一短促的，但充满了历史转折意味的时期，确实出现过不少具有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惊世骇俗”之作——小说以异乎寻常的“轰动效应”体现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如《班主任》(刘心武)、《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最宝贵的》(王蒙)、《灵魂的搏斗》(吴强)、《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许茂和他的女儿》(周克芹)、《顶凌下种》(成一)、《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重逢》(金河)……我们都熟悉这些小说，都能够回忆起这些小说对许许多多正处在苏醒过程中的读者所产生的灵魂冲击力及震撼作用。当然，这已成为小说创造与小说接受的历史，但历史不应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这些小说之所以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审美效应，这不能不归结到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小说大都可以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控诉文学”，因为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一种诚挚而愤怒的思想情感(如刘心武的“救救孩子”)，描写了十年动乱的暴虐及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痛苦，而那种血与泪的各式各样的艺术传达，也就在读者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轰响与共鸣。当然，作为小说，作为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这些作品也没有仅仅以罗列罪恶为能事，它们更多地反映的是十年动乱给善良的人们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创伤

与精神遗憾，而且基本上局限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70年代末的那些富有批判精神或反思格调的小说，是具备相应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作品所描写的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对象：农民——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风雷》、《艳阳天》这样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们已经以各自的生动描写记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足迹，而《许茂和他的女儿》则以令人辛酸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70年代的中国农村所呈现的新的生活矛盾，其中的血泪坎坷，很可以使读者领略到中国农民在历史发展的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所蒙受的不幸，以及他们不能不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是一部具有特别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正像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所见到的那样，许茂是一个经历了中国当代农村风雨的人，而他的命运也就具备了“史”的性质，所以作者对历史的沉思决不可能局限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危害——作家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具备更为纵深更为宽阔的历史性的审美眼光。

随着中国社会对于极左思潮的深入批判，小说描写也开始涉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生活内容了，但这种“涉足”决不是恢复以往的描写模式，而是以反思或重新评价为其特点的。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等，就是作家们以此时此地的新眼光尝试着描写与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的极富时代感的小说。毋庸讳言，无论是50年代的生活还是60年代的生活，都有着值得中国小说家沉思与探索的内容，而这些作品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良好的

开端,或者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小说真实地描写中国当代生活的空白——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岁月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作品的“现实性”也是难以被容忍的。这方面的成绩及创造性,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胜利。

我在这里也很难界定清楚:为什么这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现实性,以及那种与生活进程始终保持着的密切关系,则是这一文学形态及方式的重要特征。因此,7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触角,不仅深入到了上面谈到的那些生活领域,即十年动乱的领域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更为复杂而已被称为“历史”的领域,而且对正在进行着的现实生活,也有着敏锐而及时的反映,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等等。这些小说明显地留下了“干预生活”的色泽。不过,在现实主义的理解方面,我并不主张所有的小说都要及时地对眼前现实作出反映,不是的——我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其创作的恩情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扮演一种社会良心的角色;倘若作家们(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社会现实持一种冷淡或漠视的态度,其作品就可能失却应该具有的相应的历史使命感与现实责任感,那文学也将丧失最基本的、乃至最初级的存在理由。现实主义品格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必然品格,也是一种不必避免的品格——诚然,我说的是“品格”。作为生活观照的姿态与眼光,每个作家都应该与现实保持密切而正常的关系——起码在思想感情方面应该是如此(题材选择与小

说表现方式则是另外一回事)。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某些特点,我想举荐这样三部作品:方之的《内奸》、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上)。这三部作品虽则都有过被肯定或被称赞的评论,但因这方面的评论往往缺乏“史”的参照而终于使人们较少注意到它们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领域的真正突破,或者说,较少意识到这三部小说(当然还有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具有浓厚转机意味的重要地位,因为当时的我们常常下意识地过分注重小说在思情的描写方面或是否尖锐触及社会问题方面所倾注的开拓性与创造性。

《内奸》的艺术构思具有 40 年的时空跨度,这对于一个短篇小说来说,也许是件困难的事,但这部小说却经过巧妙的结构,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与“革命”有瓜葛的“商人形象”。写“商人”而写“革命”,并把这个人物作为“主角”,作为歌颂对象,这在当代小说史上是少有的,甚至可以说,这在那些把坚持工农兵方向曲解为必须把工农兵当作小说描写对象,必须歌颂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阶级分析”的岁月里,《内奸》将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冲破题材“禁区”的问题。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虽然富有传奇色彩,但作品的主体线索却是当代文学界历来忌讳的人的命运与爱情坎坷。这部小说的时空跨度也有二十余年,但它通过苦难的但又是真实的爱情描写而暴露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黑暗”,并由此而展示出复杂广阔的生活内涵。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所包孕的思情要比同时期的《爱情的位置》具有更厚实艺术力量;而它的诞生,并受到社会阅读的热

情肯定与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其本身也很能说明当时的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变化。《黄河东流去》(上)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的背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大堤而造成的空前灾难事件,它的描写内容则是黄河儿女们的悲欢离合,以及那种于顽强斗争中寻求生存的民族品性与民族精神。至于这部作品的立意及描写,李準曾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说过,他写这部小说“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但他又表明:“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但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我想,这就是《黄河东流去》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今天,我们还不能说这部小说达到了如何成熟完美的程度,但就作品的诞生年代而言,即处在那样一个富有继往开来意味的历史转折时期,它的光彩也就足以明鉴昨天而照亮未来的道路了。

在谈论新时期文学的时候,我们大都把7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这样说也许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创作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或成绩,特别是当我们审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状况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采取一笔勾销的判断方式:现实主义的确被扭曲过,但也不能说没有出现过优秀的作品(这种判断也可经由社会阅读的分析渠道而获得某些印证),起码是产生过强大的影响。而这些作品不仅在接受的可能性方面养成了社会的阅读习惯,同时也熏陶了一

批最后成为小说家的社会成员——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与影响：我们所例举的活跃于 70 年代末的小说作家，大约都读过巴金、茅盾、老舍的作品（当然也读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这样，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影响，也就构成了这些小说作家的文学观念的一部分：什么是现实主义？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之外，更具体的印象则是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对于作家来说，概念的系统总是比较抽象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依据概念的系统来制造自己心目中的小说。我们应该承认，无论是李準、王蒙、茹志鹃、刘真、高晓声、吴强，还是作为“新手”出现的刘心武、周克芹、蒋子龙、陈世旭、冯骥才、金河，他们于 70 年代末写下的那些被称为“优秀作品”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保留着或流露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痕迹，其中的承袭性是明显而毋须掩饰的——其实也不必忌讳这种承袭性，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即使在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所讨论的问题与讨论过程中所用的概念，甚至是所坚持的理论框架与文学观点，都与现当代文学传统维系着紧密的联系：在许多方面，正确的或比较合理的结论，或多或少是作为某种可靠的传统观点的延续或发挥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等。只是到了 80 年代中期之后，理论批评界才较多地开始运用西方现代文学（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概念，甚至还出现过不得当的“过火”现象。

但在我看来,“回归”的说法毕竟只体现了文学发展的部分真实,因为它的全部真实是:7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是携带着新的因素、新的萌芽与新的潜在力量而回到现实主义这块故土上去的,就其文学特质而言,它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当代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区别。因此,与其说是“回归”,还不如说是“复苏中的舒展”,但无论是“回归”还是“舒展”,都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无可抗拒地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转机的集结点在哪儿呢?就在作家们(不是几个作家,而是一批充满了创造活力的作家)的观念趋势方面:怎样才算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应该写些什么?应该怎样写?它的使命感或社会责任感如何获得体现?这在70年代末的小说作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展”:题材选择、形象结构、人物刻画、描写题旨、表现格调、批判精神、传达意蕴的方向等等,都出现了空前的大变化,而原先被认定为“金科玉律”的诸如“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以及种种荒谬思潮哺育下的文学“戒条”纷纷崩溃或消解。倘若没有这种根本性的小说观念的巨大变化,那一系列好作品的诞生是决计不可能的。所谓“复苏中的舒展”,全然是一种现实主义观念被解放的结果——当然,仅仅是“解放”。

这种现实主义复苏过程中的“舒展”现象,尽管在今天看来免不了带上几分拘谨的色彩,但它是从崩溃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于是,它的形象就显得格外高大,“效应”也格外“轰动”……我想,即使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大踏步地前进了,但70年代

末的这种“舒展”，也将以其伟大的文学史意义而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风景也绝不可能再出现！

第二节 从创作方法到审美精神的潜移

尽管我们不断地唠叨“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复苏”、“现实主义舒展”、“现实主义反思”等等，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否考虑过呢？恩格斯虽然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但只是传达了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或者说是表述了他的“现实主义”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起码不能认为：因为有了恩格斯 1888 年的《致玛·哈克奈斯》，“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就实现了完美而永恒的解释——这显然不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当然，我们也曾读到过不少阐释“现实主义”的论述，但说来说去，大都是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系统”。时至今日，文学界还有意识地对“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讨论，但这种讨论既远离现实主义的本意（如它的批判性及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又远离当前的创作实际，仍然在概念之间兜圈子，或仍然进行着以前曾经做过的相当无聊的逻辑游戏。其实，如果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史的范畴来理解，问题就要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讲“现实主义”恰恰是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范畴而运用于各种文学场合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致失去严格的界定而使它飘摇于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批评的风雨之中。